

王达津文粹



全，从纸张说有开花纸、宣纸、竹纸、本

一、有袖珍本、巾帕本（送礼用）等不同。线

上是一部汉古体诗，^{大本}一部陆放翁诗，一部精

刻。

此外在^兄那里看了蒋光赤、丁玲、沈

冰、谢冰莹、刘芦隐、郭振铎、周扬人、高

品，也有过侯波平的小说，当^是昨晚

。对^是最深的我亲身^是清楚^是过的

文章。

在小学初一就开始读旧小说

时，下午七点放学就到^是而单独

时，下午七点放学就到^是而单独

时，下午七点放学就到^是而单独

时，下午七点放学就到^是而单独

南开大学出版社

王达津文粹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达津文粹 / 王达津著.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310-02555-5

I. 王...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64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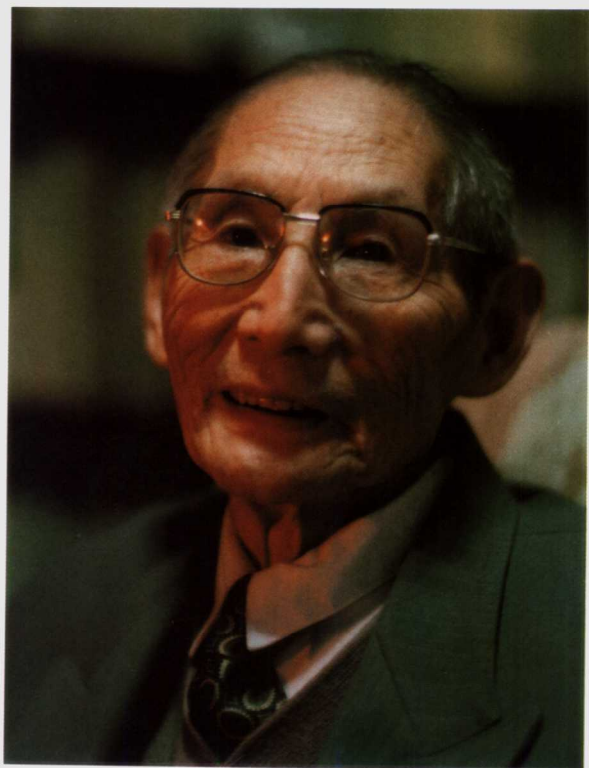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660×960 毫米 16 开本 34.75 印张 8 插页 390 千字

定价: 70.00 元(平装) 80.00 元(精装)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王达津先生 (1916-1997)



王达津先生在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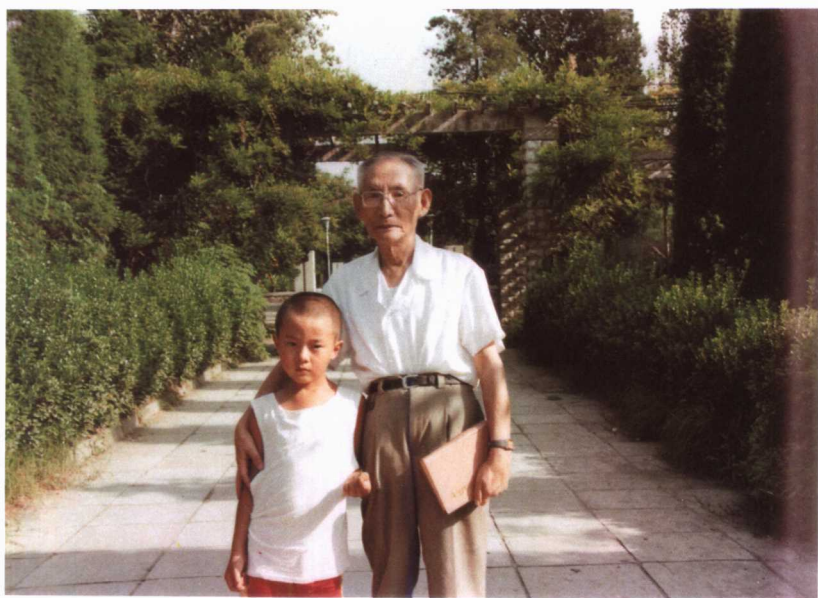
王达津先生和他的博士生



王达津先生与出席学术会议的中日学者合影



王达津先生在广西李商隐诗歌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祖孙合影

智者达老

——跟随王达津先生 45 年(代序)

宁宗一

一

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实施大规模调整(简称院系调整),王达津先生从北大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 年暑假后,为集中管理,南开取消了三院制(即文学院、财经学院、理工学院),把全部师生统一集中于八里台的南院,即原来的理工学院。当时的中文系在主任李何林先生的领导下,教学体系、教学秩序和课程安排已逐步走向完善。在中文系的课程中,重头戏是中国文学史。因为我们已经是三年级学生,文学史课程要上三个学期,所以这门课程要跟着跨入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而且学时所占比重极大,每周八节课,因此,每个学生都明白中国文学史在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分量。但那时,中国文学史课程还没有正式的教材,甚至像后来部颁的文学史教学大纲也还没个影子。于是,在李何林先生的指导下,由古典文学教研室具体安排,按照每位老师的所长,再按诗、文、小说、戏剧、文论等文体划分去设置课程的教学。当时达津先生分讲散文。他从先秦、两汉一直讲到唐宋元明。虽然他的课要在各段文学史中穿插进

行,可是从总的学时来说,他讲得最多,讲的时间也最长。一年多下来,他把中国散文发展史梳理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课时多,我们接触他的时间也就多了很多。达津先生平易近人,开朗幽默,更增添了我们对他的几分亲近感。而这就引发了后来对达津先生称谓的变化。

一次达津先生给我们讲《左传·宋楚泓之战》,在解释“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时,达津先生为了讲解得形象、生动,俏皮地指着自己的花白头发说,“我这个头发就是二毛”。一句话引得同学哄堂大笑。其实达津先生当时刚刚迈入不惑之年。那时我在班上岁数比较小,又调皮,竟然从先生的“形象化”教学比喻中,引发了改王先生的称谓为“达老”的念头。本来把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师称为“老”,确实不伦,因为当时学界的范文澜、郭沫若和政界的徐特立、谢觉哉才被敬称之为“老”,那是因为他们年龄或近花甲或逾古稀,在学界、政界有威望所以才被称之为“某老”。而达津先生那时还只是一位处于壮年的老师。但这一颇带调侃意味的敬称,没想到竟在同学中传开了,而达津先生知道了也未介意,颇有欣然接受之意。于是“达老”的尊称,就被我们从当学生时一直叫到先生的仙逝,乃至今天我们追思先生时,还是尊称达老。达老谢世时享年八十有二,所以称先生为达老,算是名实相副了。不过,达老从中年到耄耋老人,一直这样被人尊称,可能在南开中文系还是第一人。

其实,称达津先生为“达老”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一般在学界,被称为“老”并不仅以年龄为唯一标准,更多地在这尊称中含有对这位老师的道德文章即人格与学问的钦佩与称许在。达老在我心中绝对是一位饱学之士,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很早就了解达老年轻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时就和南开历史系著名教授王玉哲先生一起师从唐兰先生(参见郑天挺先生的

回忆西南联大稿),而且从我们的具体印象到总体感受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大三时达老讲到两汉散文时选了王褒的《僮约》,又在讲唐宋散文时选了韩愈的《圯者王承福传》。当时我们没觉得奇怪,更不会了解达老选文的深意,先生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记什么。可是达老非常看重这两篇文章,他不仅疏解了文字,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作品的题旨,而且还组织了两次课堂讨论。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朋友都还记得,当时全国高校教学都在积极热烈地学习苏联的教学法,而教学环节中就有一种叫“希明纳尔”的活动。“希明纳尔”即课堂讨论也。达老在前后组织这两篇重点课文讨论时,都要求我们写出详细的发言提纲,所以在课堂讨论时,同学发言踊跃,各抒己见。当时,我也有一段很长的发言。最后是达老针对同学争论的焦点,发表了他的意见。而那时文艺理论界和教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达老正是抓住了这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两次用当时的新的文艺理论帮我们诠释《僮约》和《圯者王承福传》的认识价值,同时也深入阐述了作家世界观的矛盾。记得达老在谈及《僮约》一文时,大致有这样的话:这篇赋体散文,表面似是游戏之作,它诙谐而有奇趣,其实在真切写出家奴便了的憨态形象时,表现了作家王褒内心的冲突,既有他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上下尊卑观念,又说出了统治者对奴隶的极尽苛刻之能事,那居高临下的调侃和奴隶的苦况形成了一个不谐和的矛盾体。达老在重点总结《圯者王承福传》时,大致也是说作家韩愈既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意识,又通过王承福之口,真实地描绘了当时长安富贵之家的荣枯、贵贱无常的现实,即“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丑行。这些话和当时的情景,我为什么记得如此真切,现在想来,

就在于达老当时已经意识到必须以新的理论之矢去射作品实际之的,即理论结合实际。当然这也和当时文艺理论界正热烈探讨“形象大于思想”、“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等问题有关。但从达老方面来考虑,他真是用心良苦。当时我们在作学问上,还处在“浑浑噩噩”的阶段,全然不了解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等诸多问题。时至今日,才明白达老的“选材”不仅是严,而且是要通过选材这一环节去进行启发式教学(要补充一句的是,后来我也教了古典文学,但遍查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古代散文选》、《中国历代文选》竟都没选这两篇文章),不仅他在思考,同时还帮助我们去思考。而注重新的文艺基础理论和文艺思想的学习和实践,达老在中文系教师中也是站在前列的,这无疑对我们以后把文本解读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思路起着不可代替的启蒙作用。

达老教学的最大特色是时有思想火花的迸发。

一个时期,有些同学和老师认为达老的讲课在语言表达上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但说句实话,我对达老的哲思睿智和灵性始终属赞美一派。达老讲课属跳跃式思维,他虽有讲稿在,但他的思维常常冲决讲稿的束缚,任他的思绪飞驰,而他的语言表述又往往跟不上他的思维的敏捷,于是,人们常听到的只是他思想火花的噼啪之声了。达老讲课幽默、风趣,比喻奇绝,信手拈来。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达老是一位善于“博喻”的文学智者。他善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比喻来表达一种思想,一种事物的方方面面,而在其中又常突兀地冒出前人所未发的奇想。而那奇幻之想象往往又具有他自己那诗人般的认识特点。我想,这可能就是“浮想联翩”的绝妙注解吧!也正因为如此,达老的课很少有人云亦云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他讲课体现出他的学术个性,包括他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角色特征等

等。至今回想起达老的讲课风采,眼前浮现的仍是一位独立不羁、睿智聪颖、热情澎湃的诗化学者。

所以,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观照当时达老讲授文学史的境界,我想,是他善于用他屡屡迸发的思想火花去激活他所讲授的内容,又用生活中的感悟再去激活学生的思维。他抛弃了教书匠式的呆板的、僵化的叙述语言,急切地要用自己的灵、智二气去感染学生,并引领学生去领略文学诗美的精魂。

二

一晃到了1954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机缘巧合,我又分配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当时我是教研室中的唯一青年教师。22岁的我,除了历史系和外文系的中国文学通史的教学任务外,就是当“小跑”。“小跑”者就是教研室秘书也。那时全系只有两部电话,连系主任家都没有安电话,这样,系、室两级的事情,都要由我骑着自行车去转。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知教研室开会。教研室会有三大内容:一是政治学习,二是教研室例会,三是业务理论学习。政治学习由支部的党员主持;教研室例会由孟志孙先生主持;业务理论学习,由于主要是学文艺理论,所以就由我这个小秘书代替孟先生主持了。当时的业务理论学习,其实就是学苏联的文艺理论,而又以《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丛》为主要参考。讨论学习的时间最长也最热烈的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另外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的问题。业务理论学习,会上发言的积极分子是达老。他思维活跃,最喜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往往能打开理论的另一个层面:智慧和智性的表达。他掌握的文学史资料丰富,又对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很熟稔,于是,他的发言总会引起更加热烈的讨论。现在印象最深的是讨论古代具有“革命性”

“民主性”的作品是不是当时的上层建筑的问题。达老坚持古代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窦娥冤》等，是“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此说的提出，竟引起一个学期的争论，直到读了维诺格拉道夫的论文以后，达老竟然是“赢家”。

再有就是学术界的那个大事件：郭沫若先生发起的“为曹操翻案”。“翻案”一事震动和波及了文史两家。华粹深先生和我也参加了戏剧界的讨论。可是后续的故事是引来了对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先是郭老发难，前后有三四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后来又有几位学者写了文章。达老则前后发了两篇文章。我当时正好担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的通讯员。我虽对讨论《胡笳十八拍》不懂，也不感兴趣，但却较为了解内情。我只知道达老的最后一篇是再次质疑郭老观点的。以后，再未见郭老“还招”，讨论也就此告终了。可惜的是，师妹这次选编达老文集时，竟未能收入一篇，可能是她不了解这段公案之故，也不太了解达老在这次讨论中所作出的贡献，但至今我还是为达老而自豪。如果有暇去翻阅一下“文学遗产”编的讨论集，就会发现达老的最大特点是他以丰富的材料为根据，准确地把握住了触发蔡琰创作构思的关键。而在考据与释义的文字中，又似指间抽丝，一步步地展开，剥皮去核，清清爽爽地把自己的观点摆在读者面前，其中的神来之笔，不能不让读者信服。

其实，我们从达老身上学到的做人与做学问还不仅是学生时期的听课以及后来读他的书，而是在我当“小跑”时一次又一次成为先生家中的“座上客”就开始了新的学习。那时，我要经常到各位老师家送开会通知以及办理其他事宜。达老家离我们单身宿舍最近，我总是最后到达老家“休息”一下。如非例外，达老和师母都会亲切地说：“小宁，坐会儿，聊聊天。”达老开朗幽默，

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情，风骨洒脱，绝无拘泥古板之态。人与文，文本与人本完全契合，所以我能较早体验那常言所道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真谛。本来，达老这一代学人，几乎都能做到中西逢源，古今无阻，触类旁通，书为人役，遣章无忌，学术心灵充分自由。然而具体到达老，我更深切地感到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者，在其心灵深处，有着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永难割舍的爱恋与执著，但是又能以全付生命抗拒着传统文化的僵化与腐化。因此，他的清醒的理性，使他善于从任何进入感觉范围的书与事中，极为迅速地转化为清彻的思想闪光，从而体现出他学识上的博大精深。记得六十年代初，他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就开始思考如何把古代文论中的范畴、概念、术语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当我的头脑中和讲课还把“意境”停留在“情境交融”的层次时，他就指出那不是意境或不是意境的全部，那是一种意象，意境应是形而上的哲思。后来的每一次谈心，都是我走进他的心灵的时刻。我越来越发现达老思维的活跃，观察力的深邃，视域的开阔和介入的深广。他的获知力实在令人惊叹。他给我最深刻影响的是，他具有极强的当代意识。在他的口中，我能领悟的历史图像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以及观照方式乃至独有的话语逻辑。这就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越是具有充沛的才华，他写出的和谈出的学术见地就越具有个体生命的特色。如果能进一步静心研究达老的代表作您就会发现，他从不重复别人。还记得他曾对我反复说过，任何阅读和研究的起点都是你当下的感受。他还说，任何古典名著都是当时的人抱着当代人的思考写给当代人看的，那么，你要去研究古典文学作品和把握他的文心，是不是也应当考虑当代人的感受呢？真的，那时我还不甚了解克罗齐的名言，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来，我做起了研究工作，才

真正了解到多年以前，达老的观点就与克罗齐的经典名言暗合。达老的学术生命一直富于朝气，富于当代性，而且是自觉的，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

从我听达老讲课开始，我就有一种直觉，先生才情过人，学问渊博。后来有机会私下接触，这个感受就越来越具体化了。当我面对达老时，无论是他回答我幼稚的问题还是听其独自抒发感兴，那真像是在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中神游。他常从学问谈到人生，又从人生况味中谈到学术的精义。而我则在休闲式的倾听中，领略先生的音容笑貌，观察他的心态流变。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你定会感受到他那天纵之神思，那机锋妙谛，这一切都从他的嘴角流泻出来，使你享受的是灵动的思想与艺术的感觉。

由于教学的需要，我要系统地读古代戏曲、小说。我除了要向导师华粹深、许政扬先生请教，我还常向达老提出积压下来的问题。而达老对“三言”、“二拍”、《金瓶梅》和《水浒传》的熟稔，令我折服。他知道得太多了，连《金瓶梅》中所写的灾异、水患、旱灾、明代的建筑风貌以及娃娃亲都了如指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达老在报刊上就连续发表了近二十篇有关《金瓶梅》的札记。后来，《今晚报》也希望我陆续写点有关《金瓶梅》的文章，我的回答是真诚的：“达老写了那么多，写得那么好，涉猎那么广，就先读他老人家的文章吧！我们就先别写了！”

记得几年前曾看到一篇谈及与老师平时闲聊感受的文章，内容大致有这样的话：话题可以漫天游荡，虽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话锋一转，就都变成了一大堆学问。这一点我很有同感。真的，与老师神聊，往往无所谓学问和非学问，但对于有心人来说，从老师的聊天中可以随时听到学问。现在我早已逾古稀之年，我也不时在年轻人面前喋喋不休，我不知道他们对我这个